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一期 ——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7c)

【当事者说】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陈楚三
【拒绝遗忘】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丁 东
【往事非烟】	回忆文革“串联”	肖 郎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三十一)	孙怒涛
【百家争鸣】	毛泽东执着的理念	周龙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 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 陈楚三 •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即“老红卫兵”，1966年8月“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老红卫兵的一句口号），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

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学生，新世纪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我给李志民的信既没有草稿，也没有留底，就直接寄出了；李志民告诉我，当时的青干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他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

由于我的信当时未留底，上述我信的内容只能是大意。

据说，后来刘泽彭将我给李志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陈云对我的信做出极其严厉的批示。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中提到的“陈楚三的材料”，应当就是我的这封信和他的批示。据了解，关于我的信及相关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有人说是《参阅文件》）下发。

我曾在2011年7月给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把有关此信的中央《参阅文件》副本，或者写有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我的信的副本，给我一份。一方面，此信我没留底，又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示，给我一份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纪念。”但一直无回音。

我所期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由米鹤都采访，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正式出版，其中有陈云的批示。现转抄如下：

〔孔丹的信和陈云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略，见本刊zk1403d《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一文——编注〕

原编者注：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名代表之一，后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贵州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当教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总参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文革后直接上吴敬琏的研究生。1981年任张劲夫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

## 【拒绝遗忘】

###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 丁 东 ·

凤凰历史：近期陈小鲁、宋彬彬公开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我们知道在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曾经多次提到韩爱晶为文革中打彭德怀耳光的行为做出了检讨和反省。而蒯大富本人也在口述史中，多次为自己当年领导武斗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反思。虽然《清华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蒯大富其他的口述史也早已出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韩爱晶的检讨和反省？

丁东：个人回忆文革中的行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并不是从陈小鲁才开始的。为什么陈小鲁特别引起关注呢？因为陈小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群体，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向当年受过伤害的老教师们道歉。这与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和忏悔，是不一样的。

宋彬彬公开道歉，受到陈小鲁和八中校友会的启发，陈小鲁直接促进了这件事。师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邻，陈小鲁也认识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发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让老三届学生很纠结，几年前她们通过校友募捐，给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与和解，但影响仅在本校和校友范围之内。这次她们看到陈小鲁道歉反响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动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

你谈到韩爱晶，他写的书我看过，也写了书评。他在书中谈到当年打彭德怀一耳光是错误的，但道歉不是那本书的重点。那本书以讲述蒯大富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兼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和对文革的认识。他对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文革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判断，肯定文革；第二种是坚持邓小平的判断，否定文革。其基调是：文革是领导者犯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一场动乱。罪恶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坏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干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他们在八十年代通过“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等组织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主张以独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对毛泽东有所保护，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发动文革的第一动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韩爱晶、蒯大富，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发动，就没有文革。我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我主张实证研究，不回避一切真相，尽量恢复真相，而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的说法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研究导向。比如，我想正视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状态和施政方式。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们也预感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并没有保护受到冲击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是想把运动的对象控制在一定范围，自己就过关了。好多高级干部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和做法。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独立学者，一些文革的当事人，既摆脱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基调，也超越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力图真实地还原文革的历史面貌。反思文革，总要有个价值准绳。我主张以普世价值为准绳，以人权、法治为准绳。拿这个标准作尺度，重新检讨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

目前中国，价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韩爱晶的表达权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重视韩爱晶等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独特的经历，他不说，别人可能不知道，历史细节就被淹没了。所以他写的书，我比较重视。但韩爱晶对文革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固守毛泽东的文革观，现在还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人类探索政治文明已经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巴黎公社不是为当代中国治病的药方。

凤凰历史：韩爱晶在书中曾经提到：“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对于韩爱晶认为判他是反革命并不公平，您怎么看？

丁东：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种人”，对大学生文革中的表现记录在案，“整党”的时候也要审查党员在文革中的表现。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陈云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老红卫兵当时就解脱了。而文革其他阶段的积极参与者，则品尝了苦果。

比如有一位老三届中学生翁永曦，1980年曾参与改革建言，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被中央采纳，称为“四君子”之一。他原来是《农民日报》记者，机构改革后当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老三届”里第一个进入副部级的人。有人向邓小平、陈云告状，说他是造反派。结果一撸到底，万里想让他当县委书记都不行。

当时对造反派采取了严厉的政治手段。能力再强、群众评价再好都没有用，一定要拿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四川的蔡文彬，山西的李辅都是如此。韩爱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知名度就更高了。对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际上出于当政者的政治需要，和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不是一回事。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像韩爱晶他们这样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造反派，还有没有必要公开地道歉？

丁东：我觉得，凡是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伤害的人，都应该得到道歉和补偿。韩爱晶打了彭德怀，当然对不起彭德怀，应该道歉。但是也要考虑，他被判十五年，当局对得起他吗？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很多人，谁应该负第一责任？该负第一责任的人被供起来，让下面的追随者承担后果，这公平吗？

韩爱晶为什么不服气？他和后来的掌权者也有对比。他23岁就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航在文革中并没有分成两派，韩爱晶当时威信挺高的。当时打下了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国家需要仿制发动机，别的科研单位承担不了，韩爱晶主政期间，学院成立三结合小组，完成了这个项目。韩爱晶在大学当了两年一把手，身份还是学生，仍然靠父亲每月给30块钱维持生活，没挣公家一分钱。河南兰考代表团来北航交流，他都不敢陪人家吃饭。他说：我是学生，要是陪人家吃席，就搞特殊化了。他让革委会里的老干部去陪客吃饭，自己到学生

食堂排队买饭。他自己信奉巴黎公社原则，确实是真诚的。

当时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许多人既伤害过别人，又受过别人伤害。过来人应当还原到具体环境中，弄清楚在什么问题上了伤害，在什么问题、什么程度上伤害了别人？对于伤害别人的事，应该道歉，但是只能承担他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宋彬彬道歉后，有人觉得宋彬彬的道歉不符合他的预想，发出了激烈的质疑，引起了新一轮争议。我觉得，宋彬彬能走出这一步，应当支持。

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在 66 年 6 月 2 号贴出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已经没有底稿了。没有证据表明这张大字报有诬陷或致人死地的内容。据她们回忆，就是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的运动跟上形势。当时师大女附中只有她们几人是学生中的党员，她们想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第二天胡启立支持了她们，接着工作组进校，她们成了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原来的校领导就靠边站了。刘进、宋彬彬现在为当时贴大字报道歉，是一种反思文革的实际行动。

在 8 月 5 号卞仲耘被打死这件事情上，她愿意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劝阻不力，制止不了。这符合当时她们的身份和实际情况。7 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工作组撤出。刘进和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威。因为工作组支持过她们，工作组已经被否定了，她们说话也不灵了。她们当时未必认为校领导是好干部，但是不赞成对校领导实行武斗。她们劝阻了，但是说话不算数。后来卞仲耘被打得不行了，送到医院，医院不愿意抢救，宋彬彬也参与了交涉，直到晚上 8 点 55 分卞仲耘去世。她那天的情况，师大女附中的师生有回忆。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回忆，我认为，让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主要责任，是不客观的。

打死卞仲耘的是不是红卫兵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师大女附中虽然在七月底八月初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很边缘。8 月 5 号打人的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参与暴力的女生，不论是高一的，还是初中的，她们当时还没有红卫兵身份。但是那几天形势变化特别快，8 月 5 号没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可能几天后就参加红卫兵了。至于有人提出，清理这段历史的时候，该不该对当事人指名道姓，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了。

8 月 18 日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的姓名，引出了“要武”的说法，这话由党报传播出去，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宋彬彬今天能够反思到“要武嘛”这句话“激发了疯狂”，“造成了生灵涂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反思是不是应当更加深入，这是一个可以交流、切磋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种猜测与真相可谓南辕北辙。官方不但没有操纵道歉活动，反而让主动报道道歉活动的媒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研究文革已经 20 年了。20 年来，我深知研究文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官方从不鼓励。

凤凰历史：有人说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是为了出风头，您怎么看？

丁东：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说老红卫兵什么便宜都要占到。我认为，无论是陈小鲁还是宋彬彬，他们的初衷不是这样。老三届已是 60 多岁的人，老三届的老师最年轻的将近 80 了岁，有的已经 90 多岁，当时的校长基本上都去世了。现在再不道歉，达成师生和解，就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这次推动师大女附中道歉活动的老三届校友，以及一直主张还原历史、澄清真相的人，相当一部分并非高干子弟，不是红二代。比如冯敬兰做了很多工作，她当年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顾湲是顾颉刚的女儿，当时也是受压抑的学生。她们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亲历者，了解情况，就应当澄清真相。同时推动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你的责任要道歉，不是你的责任也应当澄清。不同家庭出身的校友，共同反思历史，推动和解，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宋彬彬过去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前流传一些说法，让人感觉宋彬彬就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澄清了。更重要的一件事，2007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时，评了90个杰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展览和纪念册，把卞仲耘的遗像和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放在一起，又没有作出到位的反思。让人感觉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是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这就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也提出了抗议。这就宋彬彬推上了风口浪尖，放了非常尴尬的位置。实际上宋彬彬并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具体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么出名，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她的父亲宋任穷，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上有人对权贵不满，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她公开面对媒体太迟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言，使她十分纠结。家庭和亲属，对她面对媒体也有不同的看法。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引起的争议再次集中到宋彬彬头上。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猜测和引申，这是很难避免的事。要想完全走出历史的阴影，恐怕还得进一步敞开心扉。

凤凰历史：但是大家很疑惑的是，真正打了卞校长的人并没有站出来道歉，这里有什么隐情？而且为什么在道歉或者反思中，很少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自己比较严重的污点，比如承认“是自己亲手打死或打伤了某某某”？

丁东：亲自伤害人而道歉的也有，不多。老鬼在《血色黄昏》中承认1967年批斗胡耀邦的时候，担任押解的角色，伤害了胡耀邦。他的书出版后托人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后来给老鬼沟过话，意思是给我的书收到了，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最近也有动过手的人表示反思和忏悔，但不很普遍。有人有顾虑：如果你公开承认打过人，别人可能怀疑你杀了人；你承认和一个人死亡有关系，别人可能怀疑十个人死亡和你有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受到指控的人，有没有充分的辩护权利？是实际问题。所以我对那些有顾虑的人表示理解。现在的大环境，还不能保证真相与和解。西德总理勃兰特出面道歉，南非总统曼德拉主导真相与和解，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可以掌握事态，不至走偏，我们情况不同。我们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认识到自己不对，表示道歉、忏悔和反思，就迈出了历史的阴影。但是我们不能强求别人。

凤凰历史：在近期的文革道歉潮出现以后，您认为现在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吗？

丁东：对文革的反思，目前主要是民间正在做，研究的动力在民间。一些人曾经有官员身份，是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才参与反思。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反思文革，当事人和后来人做起来是不一样的。文革的过程太复杂了。从1966年到1967年，老红卫兵、批资反路线的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动力一茬一茬地换。过来人或许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能有比较贴切的理解，后来人往往很难理解。最近这二十多年，文革的相关信息受到屏蔽，复杂的情况很难得到充分展示，更缺少讨论的空间，容易让人把文革想得很简单，非黑即白。

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角度考虑，主张“宜粗不宜细”。因为既受过害，又害过人的干部太多，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扯不清了。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是始于文革，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后来有延安整风。1959年毛泽东决定整彭德怀，中央全会的会场跟文革批斗会也很相似。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价值就在这里，他把党内高层氛围和逻辑呈现出来了。

凤凰历史：我们看到某人在文革中的死因，总是遭“迫害致死”，这里迫害的主体可能有很多？

丁东：文革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由青年学生或者基层群众打死的人多，还是有组织的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把所谓“地富反坏右”赶回原籍，确实使不少无辜者致死致伤。但一些规模更大的非正常死亡，比如北京郊区大兴的惨案，则不是自发行为，而是基层政权主导的行为。再比如1967年在湖南道县及其周边发生的致死数千人的惨案，也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地方人武部主导下，公社、大队两级政权的暴力行为。他们在当时鼓吹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要来一次土改重演。道县杀人为什么杀得多？因为“地富反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68年，广西军方镇压422，整死的人就更多了。地方政权、基层组织，大开杀戒，后果比青年学生针对校长、老师的暴力行为要严重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人也很多，这是从上往下部署的运动。搞运动就会导致“逼供信”，精神压力太大，有人就自杀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死人也不少。

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完成了权力更叠，为了重建秩序，就要杀一批政治上有异议的人。遇罗克、王佩英、陆兰秀，都是1970年被杀害的。那一年处决的政治思想犯很多。当时已经砸烂了公检法，政法方面由军管会主持，仍然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器在行使专政职能。对这些历史的研究和反思，远远没有到位。

我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

~~~~~

【往事非烟】

回忆文革“串联”

• 肖 郎 •

1966年的大串联，发生在文革轰轰烈烈的开始阶段，我当时在上海正读完高中，有幸经历。

串联始于8月下旬，伟大领袖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才四、五天，就有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串联，出现在上海的马路和学校了，当时叫做“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这批最早的红卫兵，大都是高干子女，来上海时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颂着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派“天下，国家，社会”，都属老子家里锅碗瓢勺的样子。

这些当时看似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其实真是如后人笑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二傻子，因为一，二个月之后，他们的亲娘老子就要被伟大领袖统统打倒，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就算最轻的罪名，也要戴上顶“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而领袖用来打倒他们父母的家什，就是由他们完全自主研发和创建，又得到领袖大力支持而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仅不过这时已被另一批被叫做“造反派”的红卫兵替换掉了。这些高干子女的红卫兵，就将沦为象清末民初张勋闹复辟的辫子兵一样，是被人称为“保皇派”或简称为“老保”，被狼狈踢出了局去。也难怪他们自己没有学好“矛盾论”，没弄懂矛和盾的理论，只要稍稍“活用”一下，就可以这样说：“借汝之矛，攻汝父之盾，何如”？

这批北京红卫兵串联带到上海来的，无非是二件事：一是抄家，二是打人。上海的抄家之风始于8月24、25日左右。那时上海的红卫兵大约才成立了一、二天。所谓的成立，只是因为看了“8·18”领袖接见的报道和图片，依样画葫芦，拿块空白的红布套在臂上就是，上面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印上“红卫兵”三个毛体的草书字，这在装束气势上就矮了北京人一大截，所以只够资格给北京红卫兵带带路，就象是低头哈腰，指点指点“高家庄”“马家合子”怎么走的那样。

抄家最先在上海淮海西路一带花园洋房区开始。那地区被上海人称为“上只角”。上海的红卫兵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有钱人住哪里还是拎得清爽，一带路，就把北京红卫兵带到了那片高尚住宅区。上前一拍门，先问是否干部或部队的，怕是打搅了自己人，因为当时的高干们进了上海城，也是占了市里的许多好房子先住下再说。虽然有些个大资本家，原大洋行买办的户主，也能紧张兮兮地拿出张奖状或证明，说自己在白色恐怖时掩护过哪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或捐出过多少钱帮共产党新四军买药品或其他急需物资，就象电影“活着”里的福贵，说是自己给解放军唱过皮影，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但都没有用，根本逃不过一抄。这些人也不想，这都什么时候了，早就该是轮到收拾你们这帮家伙的日子了！50年先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地，56年就该整你们资本家了，反倒被你们又多剥削了十年，舒舒服服拿了十年“定息”，现在该吐出来了吧！

抄家这件事，其实是很容易学的，上海红卫兵发明创新的本事没有，照本抄书的能力倒也不小。所以到8月底、9月初，抄家已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轰轰烈烈地展开，那就不光是“上只角”的大资本家被抄，连小业主，大小知识分子，各式“牛鬼蛇神”，一个也逃不过。那阵子上海的热闹风光，实在是先沾了串联的光。被抄过的人家，勒令要在门上贴一大张写在白纸上的“认罪书”，有点象是给犹太人画个六角，可以方便辨认“敌友我”，于是上海滩上那些象样些的弄堂，街区，几天之间，“满街尽贴白纸甲”。

再说打人，上海人当时还在规规矩矩念叨8月12日通过的中央关于文革16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经，但北京红卫兵说，伟大领袖8月18日刚对一个叫宋彬彬的高干女儿说：“不要文（质彬彬）么，要武么”。所以一切应该按8月18日的“最新指示”去办，“什么叫最新指示，你们懂吗？”。

北京红卫兵打人是解下腰间的军用宽皮带，大方铁扣在前，劈头盖脸地打。“呼啦”一下子下去，保管皮带见红。北京红卫兵说：“刺刀不见红，皮带不见血，怎么能叫红色恐怖？”后来上海的红卫兵打人，由于家里没有军用宽皮带，就用包着塑料皮的电线编成的鞭子打，抡起来也有“呼啦”的声音，只是不会出血，远不如北京那玩意儿革命，所以也没有北京皇城根下被打死那么多人。但夏天衣服穿得少，皮肉被打之处，叫做鞭痕，先发紫，后溃烂。文革期间，我不幸亲眼目睹北京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人，上海红卫兵用电线鞭子抽人的情景，以及听到过被打被抽人的惨叫，这些事情，今天想来，还会阵阵头皮发麻！

那批北京红卫兵的大多数在上海才呆了一个星期不到，就又呼啦啦地南下“串”到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去了。但他们在上海刮起的旋风却是对上海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讲其他，就他们的那身装束就叫上海人羡慕不已。这些红卫兵，几乎个个都穿浅黄近白的破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腰束宽皮带，袖子卷到肘弯的地方，必要翻出一截白衬里来，才算正宗。所以上海以致后来全国，穿破旧军装是最时髦的事。穿一身旧军装在上海南京路上走，远比今日身穿阿妈泥培罗蒙西装，要来得挺刮，神气。所以现代的姑娘小子，非要弄个穿了洞的破烂牛崽裤算是时髦高贵，还嘲笑我等老“阿乡”不懂时尚，我气闲神定地告诉他们：这种穿破烂衣服扮高贵的把戏，是五十年前北京红卫兵发明的，你们到现在才知道学啊！

由于有北京人的南下，当然也会有上海以及南方各地的红卫兵北上。最早时，当时的周总理还想把这样南下北上的运动有序地控制和组织起来，他吩咐各地的学校选出“串联”代表，或分期分批出来“串”。根据总理的这一安排，我们中学里就正儿八经，开了好几天的大会来选代表，大家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最后终于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几个代表。但这一个来之不易的结果，后来立马就被没选上的人给废了，理由非常简单：“他们去得，我们为何去不得？”是啊，说得有道理啊，阿Q先生当年摸小尼姑，不也是这样发问，又有谁能驳倒阿Q呢？加上北京每隔10天半月，领袖就要接见一次红卫兵。全国各地千百万革命学生，人人都象阿Q先生这样来发问，又有谁能拦得住呢？所以扒火车上北京的人是越来越多。结果是索性打出招牌：“坐火车不要钱”。这样一来，全国的大中学生，甚至包括年青教师在内，几乎倾巢而出，人人都在各地“流串”了。

那时虽说是坐火车不要钱，但坐火车也不是什么好滋味。那种挤，让人难以想象。不单是所有的走道都插针般地塞满了人，连厕所里也是挤满了人，行李架上、椅子底下都躺着坐着人。能坐在窗口的小茶几板上，算是个很不错的位子，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只能站着。坐茶几板这个位子，最累是左右都没有地方可靠，要打起瞌睡来，头没有地方可歪。就有聪明的人用背包带穿过上面的行李架，做成个象上吊似的绳环，这样把头伸进去，正好可以在瞌睡时托住那个七斤半的东西。这个发明很实用，所以很多人都模仿。晚上时分，你顺车厢往两边尽头一望，便可见一排伸在绳圈里的头，随着火车晃动的节奏，在“浪呀么浪打浪”般地摆动。

串联时的火车都是没有班没有点的，什么时候，要走就走，想停就停。火车一停，人们纷纷从车窗口爬上爬下，因为想从车门进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下车来，一是找吃找喝的，二是找地方“出货”。那“拉”可是个大问题。错过了这个村，谁也不知再开多久才有另一个店。所以也有经验不足的男女孩子，在车上实在憋不住时，最多几个同学站个人墙，或拉块布什么的，略为挡一挡，就从车窗口向外“卸货”，根本也没办法顾得上人多眼杂。就是常常苦了后面几个窗口的人。要赶上这种时候开窗透气，就会受到“水飞顿作倾盆雨”的革命洗礼。

我到北京已是11月20日左右，记得到了后，就被安排住在离地安门很近一个胡同里的接待站，吃饭就在院子里的一个食堂。那时在北京吃饭不用花钱，到开饭时，进去吃了抹抹嘴就可以走人。每天是米饭、馒头和熬大白菜，一星期还开二次荤，一人一勺子红烧肉。北京胡同里大妈们做的米饭很有意思，她们并不洗米，而是直接把米先倒入水里煮，到半熟时将米捞出，上笼屉蒸，米饭蒸熟后一粒是一粒，象爆米花一样不粘，而煮米的水，叫做米汤，可当稀饭喝，一点儿也不浪费。

那些接待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实在是好，对所有的人一律叫红卫兵小将，根本不问你到底是什么出身成份。我由于从来没加入过红卫兵，被人这样叫，心里就象白沾了人家什么便宜似的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一个人如果不是红五类出身而想当红卫兵，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我当时中学里的一个同学，很要求进步，但由于不是红五类出身，就把他的爹娘称之为狗爹狗娘地骂了有千百遍，才被认为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而赏了他一块红袖箍，这人虽然终于做

成了红卫兵，人们背地里称他是“狗种”，照今天的话说，叫做“Son of the bitch”。

领袖的接见好像是在11月25，26日左右，那天半夜一、二点就被人叫起来了，大家集合在院子里，一人发了一盒干粮点心，里面有一个苹果，一个煮鸡蛋，一个叫做提酱饼的北京式月饼，还有一个二两大小的面包。约凌晨三点不到，队伍就雄赳赳地出发，一走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那支队伍被安排在离城楼很远的地方，记得在大旗杆以南还要有好几十公尺。这时离天亮还早，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但也不象报纸上所写的热气腾腾，因为北京的气温大约只有零下5，6度。大家坐着、等着，在原地跳着，跺冻麻了的脚。饿了，就开始吃那盒点心，渴了，也能找到茶水站，憋了，在广场一侧的历史博物馆前，有用芦席简单栏起了一排临时厕所。里面在泥地上挖了几道沟沟（当时那里就是泥地，现在应该早不是了），就算是茅坑。芦席围栏留下了一个口子做门，门的地方原先是贴有男女字样的小白纸做标识，但早已被冬天的朔风刮得不知去向。所以有上过厕所的人回来告诉，说是进厕所探头探脑象鬼子进村，进去后先要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蹲着还是站着，才能辨别是否走错了地方，不对劲可拔脚就逃。我起先感到这话也太危言耸听，心想只要未进门之前，看看门口进出的是男是女就可以，何至于要进去之后才能分辨？但实地去了以后，才知毫不夸张的。因为当时很多北方女孩都已剪了男孩子的平头，加上是冬天，这些人都戴着军帽，穿了黑棉袄或军绿棉袄棉裤，那时天还没亮，广场上灯光也暗，所以真的是“安能辨它是雌雄”。当然，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拥在里面，厕所里面可能难免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发生，但大家居然也都相安无事，各占其位，各司其行，并没有听说抓了几个流氓阿飞出来示众。

记得到了太阳有三竹竿高的时候，广场上响起了雄伟的“东方红”乐曲，于是人人知道，伟大领袖要出来了，“东方红”，就是领袖专用的出场“过门”。我已记不清楚到底是从哪一年起，国家正式把“东方红”定为是领袖的专用出场“过门”的，只是记得在文革期间，凡是“五一”“十一”领袖上天安门城楼，“九大”“十大”领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都是一要先奏起这段“过门”来做出场的引导。当然，这御用的东西，绝不是阿狗阿猫随便可拿来山寨效仿，就连“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身段，后来弄了个“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做自己的出场过门曲儿，却成了“东施效颦”，被批是迷恋于“个人崇拜”的恶习，成了他下课的理由之一，当然那是后话了。随着乐曲奏起，广场上原先坐的人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看。我明知自己近视眼，也随着大家的眺望而去努力眺望，但看了半天还是一点也看不见。问边上的同学，他有2·0空军飞行员的视力，他说也只能看见些如绿豆般大小的人影，而根本分不清到底谁是谁。我于是也作罢，不再去枉费眼神。

这时东西长安街上就开始有游行队伍，从城楼前走过，接受检阅。检阅好象要持续3—4个小时，游行的队伍才能走完，据说队伍在通过城楼前时，不能有丝毫停留，必须每分钟走60—70米的速度。由于游行的时间太长，广场上，我周围的人们慢慢地也就松弛随便起来，不象一开始那样去眺望那城楼。于是，吃东西的吃东西，上厕所的上厕所，聊天的聊天。

记得有人就讲起见到领袖以哪一种方式最幸福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接见形式，一种是领袖上天安门，大家在广场上或是从长安街走过，另一种是领袖坐北京牌敞蓬吉普车驰过，大家排在马路的两边等待。有一位东北老乡就说，几种方式见领袖其实是一样幸福的：坐在广场上，虽然见到的领袖小一些，但见到的时间长，可以看他几个小时。从东西长安街走过，距离天安门近一些，可以见到大一些的领袖，但时间短多了，只有几分钟。如果吉普车开过，看得更清楚，人也更大，但时间却更短，仅仅几秒钟。但不管如何，见到的时间乘上见到人的大小，那幸福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革命宏论，听得大家都点头称是。也有物理学得好的同学补充，说是如果再加一个什么参数，结果会更精确。我从这样严肃的革命理论讨论中得益匪浅，

并第一次知道，幸福原是可以物理公式的“持续时间”和“物体尺寸”这两个单位的乘积来表达。

领袖接见后，余下在北京的日子就可以随便去串联。我也认真去过北大、清华、北航等大学看大字报。北大、北航我没有任何印象了，清华是我原本想考的学校之一，很清楚记得那座叫做“主楼”的建筑，印象中楼很高，但周边好象只有几个很矮的小房子，无法来陪衬它，显得如鹤立鸡群。

我尝过北京著名的冰糖葫芦，感觉样子很诱人，味道却一般。文革时，北京的烧饼、油条实在是不敢恭维，烧饼太硬，又是凉的，北京人叫做“火烧”，我要用门牙啃，才能锯末般地锯些饼粉下来。油条也是凉的，韧劲十足，我要用里面的大牙，才能费劲地撕咬一块下来。这两样平民的早点，无法和上海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和炸好后能站得笔挺的油条相比。但北京的桃酥好象比上海的杏仁酥好吃，只是论斤卖，不能象上海可以一块一块地买，我曾开口想要买二块桃酥，营业员大婶一口“京片子”甩过来，我没听懂她讲什么，大概的意思是让我再想想清楚。那年代，也“不作兴”去吃“全聚德”，没那风气，我也没钱。

北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一付对联，几十年后仍常在我脑海里浮现。那天我本想去清华，但搭上的公共汽车却直奔颐和园。进了园，我顺石级爬上了万寿山。结了冻的昆明湖，亮闪闪地，尽在眼底。远近一抹山峦，如烟似黛，欲浮欲现。我凝视着那山色，正痴痴地，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石牌坊。走近那坊，见上面刻着“山色因心远，泉声入耳凉”一付对子。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那些狂躁的日子里，我读着这付不知哪个古人留下的对子，咀嚼了又咀嚼，在山上就呆呆地坐了很久，心里感到很平静，好象很久没有这样平静了。

我本来的串联计划是要在北京多呆几天，毕竟想去看看地方太多，然后也想去几个北方的大城市，如沿线的天津，济南等等，但接待站里别人之间的一个小玩笑，使我放弃了一切计划，就回家了。这件事今天说来还是很好玩：

一天晚饭后，接待站里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靠着墙，坐在地铺上聊天，不知怎的，有两帮人互相抬起了杠，都说自己身上的“革命传家宝”要比对方的好，比对方的多。大家谁也不服气，不相让，结果就在人们的大声轰笑里，他们解开外衣，很夸张地从胳肢窝，腰间掏出些东西朝对方互扔，说是要用自己的“革命传家宝”来占领对方的“阵地”。“革命传家宝”者，虱子也。

那天晚上，我身上开始发痒，我其实知道他们是开玩笑，随便抓抓，那能真地就抓出一把虱子来？连猴子都要扒拉半天呢！但玩笑是玩笑，对我还是有作用。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心理脆弱”，“神经过敏”，还是确实身上也有了虱子，毕竟出门有多日，哪能保证没被传上呢？第二天，我找了家浴室，彻底洗了一把，但晚上睡觉还是痒。我知道，如有虱子，洗澡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最多换了一下内衣裤而已，并没有其他衣服可全部替换。我心里清楚，我不怕虱子咬我，我是怕我“惦记着那几个虱子”。于是问自己：揣着“革命传家宝”，你还能有心思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吗？我发现自己很没“出息”，大概不大可能在冬天暖暖的太阳光下，背靠着雄伟长城的墙脚，翻着自己的内衣缝抓虱子。第二天，我就挤上火车，打道回府，结束了我的串联。

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我有几次到北京。北京城的变化，好象比上海还大，我根本不可能再找到地安门附近我串联时住过的胡同。我曾两次到了颐和园，爬上万寿山去找那石坊和当年见过的对子，但都没找到，我相信一定还会在的，不至于就被砸掉了。我也问过老北京的朋

友：“万寿山上到底有没有泉水？”回答是否定的，说是除非下雨，山上的水流下来，如同泉水一般。

我当然去了广场，那里比文革时多了一幢方型的大建筑，我没有进去，但象很多人一样，见过里面摆设的照片，这让我想起儿时（五十年代）流传于上海部分地区的一句童谣，其曰：“莫激动，激动要变（也有说“进”）长方形”。这句童谣，我们是在两个孩子吵得脸红耳赤，就要打起来时，在旁边起哄，叫他们不要激动，安静下来时所唱，而且很奇怪，是一定要用宁波腔来唱的。上海有很多这种不知所云的童谣，比如“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之类，这句“激动”不“激动”的童谣，我们孩子唱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也不会去问，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唱。直到后来有一位老家是宁波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说这童谣的前三个字在宁波话里是领袖的谐音，而长方形则是指棺材。

我从不相信神怪灵异之说，也不信各类玄学，唯这句童谣，我一直感到怪怪的，好象真是说中了，一语成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童谣民谣，谁说童谣民谣不藏着什么玄机呢！十年文革“激动”，不就如此戏剧般收场落幕？

2014年7月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三十一）

• 孙怒涛 •

〔上接zk1407a 第十章 回顾与反思〕

## 第二节 关于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我的再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当年团派就是以此将“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罪名强扣到414的头上，而414则是极力加以否认，认为自己并没有否定文革、反对文革，而是衷心拥护文革的。现在，文革真的已经被否定了，于是，曾有以“毛泽东的反对派”自居的朋友，沾沾自喜地高调承认414当时就是自觉否定文革的，或者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就是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

我认为，在文革中，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敢于公开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414要是敢于公开否定文革、反对文革，连几十人的人马都拉不起来，更遑论七千多人的队伍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414核心都是真心拥护文革的，414从上到下，主观上从来就没有否定文革的想法，客观上也没有反对文革的行动。谁要是这样想这样做，不仅文革大环境容不下他，414这个群体也容不了他。414提出“红线主导”论的本意，也是在拥护文革的大前提下，让文革进行得更健康、更顺利、更有利于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

但是，从“红线主导”论确实能引伸、推导出对打倒绝大多数干部的改朝换代式的暴力文革必要性的否定。这就是毛泽东反感四一四思潮的重要原因，也是团派攻击414右倾保守的着力点。尽管这与否定文革还相距甚远，我在当时也感觉到这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软肋。

相比较团派所信奉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对文革必要性的否定也是隐含的、浅表的。

4 1 4 早就消亡了，四一四思潮也早就是一个历史称谓了。但是，曾经是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红线主导”论，在文革以后确实得到了重新肯定。因为，对文革的否定，自然地就是对十七年的肯定。现在的主流说法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一直是红色的，并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一直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也就是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一直是红线为主导的。

于是，有一些老四，暗中窃喜，认为肯定十七年红线主导就是证明四一四思潮是基本正确的。四一四思潮真的必胜了。

这感觉是对的，也是不对的。

说是对的，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都重新上台了。国家机器、政权体制都照旧一如文革前。对他们来说，肯定十七年，就是肯定自己，所以，必然是肯定“红线主导”的。站在这一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感觉四一四思潮是基本正确的，“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性胜利，这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全国都是如此。”

说是不对的，那是我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线主导”论。

经过文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回过头再看看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承认，确实是毛泽东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只是要补充一句极其重要的话：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占着统治地位，是红线主导（如果把毛泽东主导的路线叫做“红线”的话），但不是正确路线主导。

反右斗争，硬是打出了几百万右派分子，把中国社会中最敢于讲真话的知识精英打没了，把中国的脊梁骨打断了。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把中国的社会搞得一团糟。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人，就是“三面红旗”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恶果。

对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把党内一批不同意见的健康力量斗没了。

1962年后，刚刚从大饥荒中恢复了一点生气的中国马上又开始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穷折腾，再次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4 1 4 鼓吹的“红线主导”论，立论依据就是这些毛泽东领导的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运动都是正确的。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政治运动都是错误的。文革前的十几年，一直是在左倾理论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左倾路线在主导。由此，所谓“红线主导”论也是错误的。四一四思潮是以“红线主导”论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四一四思潮基本上（并不是全部）也是错误的。

从这意义上说，我这个曾经是四一四思潮的鼓吹者、信奉者，今天我是四一四思潮“红线主导”论的否定者、批判者。

但是我也不是全盘彻底否定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中还是有合理的内核，那就是体现了那个时候普通民众“人心向善，民心思安”的诉求：经过了近一年的暴力文革，人们已经开始

厌烦文革，只求对待广大的基层、中层干部宽厚点，早点解放他们，早点转入“斗批改”，文革早点结束，社会早点安定，生产生活秩序早点恢复。

团派有团派思潮吗？团派自己好像没有正式提过“团派思潮”的概念。团派始终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不着再标新立异提团派思潮。而414则简单认为团派思潮就是极左思潮。

我现在认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力强大的团派，也是有团派思潮的。应该承认，团派思潮中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确实是极左思潮。

我记得团派的一位核心头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团派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彻底砸烂”！所以，用“彻底砸烂”作为团派最核心最基础的观点，是贴切的。即使就如毛泽东所辩称的“你们（团派）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那么，“砸烂一小撮坏人”依然是极左的错误口号。

但是，简单地把团派思潮等同于极左思潮也是不合适的。在团派思潮中还有一部分是：在连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人为产生的差质群体，总体上是一群有独特个性、有独立思想的人。可是他们在十七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压和歧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因而他们对十七年来不公正待遇是严重不满的。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和社会地位，通过文革的大变革，不再做一个继续受人欺负、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还有一部分团派群众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体制下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城乡矛盾等），他们对此表示严重的担忧。他们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的阴暗面有大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们希望各种社会矛盾能得到缓解，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所以，我认为，团派思潮中同样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这就是“追求社会变革、呼唤公平正义”的诉求。可叹的是，他们以“砸烂一切”的手段来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最终显现的结果与其初衷南辕北辙。他们不仅未能得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反而蒙受全面专政的更大压力。

当我们抛弃派性的残余思维，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探究最普通的老团老四的内心需求，曾经的团派思潮和四一四思潮，不管多少，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团派观点激进却富有批判精神，414态度温和但思想比较守旧。他们之中都有可取的也有应该扬弃的部分。当年，团四两派追求、捍卫各自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表达正当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整个社会环境是法治的、民主的、宽松的、包容的，那么两派理解、认同对方正确的观点，兼顾彼此合理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顽强捍卫各自的正确观点，拼死追求各自的合理利益，从开始时候的口诛笔伐，最后演变成兵戎相见。这是清华两派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文革后，“红线主导”论胜利了，提出并信奉四一四思潮的414派却被否定了。这是历史老人对414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尴尬而苦涩。

414派是保守造反派，即思想保守而行为造反，被否定了。团派是激进造反派，行为造反而且思想激进，他们被否定得更不堪。

笑得最后的是那个被造反派嘲笑并打得落花流水的“八九”派。他们（严格地说，应该是他们中的“红色贵族”们）奉行血统论，革命目标直接明了：保爹保妈。虽然他们并没有靠自己的力量保住爹妈，还是被打倒了。但是造反派的激进极左，不仅为造反派自己的垮台自掘坟墓，也为走资派的东山再起打下伏笔。“爹妈”们一旦重掌大权，立即整肃激进造反派，遗弃保守造反派，为他们的官二代上位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不仅“龙生龙子”，更要“龙传龙位”。

大结局似乎如唐伟一针见血所言的“‘红色贵族’万岁”。不过，严酷的社会现实能否让这些“红色贵族”们过上“百岁”是很难说的。

当今的社会，存在着各种派别的斗争，存在着各种思潮的冲突。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民众的福祉，但愿现时的人们汲取我们的沉痛教训，和平对话，求同存异，找到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富民强国、民主法治之路！

### 第三节 否定文革，我的一孔之见

文革历时十年，终于落下大幕。

把文革看成仅仅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是不全面的。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之斗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之间既有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上的矛盾（当时叫路线斗争），也有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手握大权才能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治国的成就才能证明路线的正确和权力的合法性。

当毛泽东感到他的权力正在被政治对手一点点地销蚀，他的治国方略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他无视几亿民众的死活发动文革，不惜把中华民族拖入一场历史浩劫。

当刘少奇的治国方略被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他的地盘（如彭真把持的北京市）被攻占，他就毫不犹豫地派出工作组，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把烧向他的妖火引向基层。

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是为人民、为群众的。是的，他们也曾经为民众做过好事。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党的利益永远是高于民众利益之的。当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党的利益开展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早就忘记了民众。那时，民众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支打击政治对手的矛，一个护卫政治利益的盾！

对文革如何评判，十三亿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种各不相同的回答，从彻底否定到全盘肯定，从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各种声音都有。我相信，饱受文革之苦之害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会选择否定文革这一正确结论的。

官方对文革的定性，最权威的文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里提了否定文革。

2011年1月正式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据主管二卷编撰和修改的中共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这是官方对文革最新最权威的提法。

既然文革是应该被彻底否定的，为什么又把文革研究列为敏感话题，划为禁区呢？要知道，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官方的这一态度，使得文革的罪恶没有彻底的清算和系统的批判，文革的遗产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严肃的甄别，文革的根源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深刻的反思。对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大浩劫竟然采取如此轻视漠视的态度，是对民众对历史的极不负责！

事实上，在赞成否定文革的这一阵营中，哪些该否定，哪些不该否定，哪些该否定的没有被否定，哪些不该否定的被否定了，这些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同样是彻底否定文革，官方所说

的“彻底否定”与民间所说的“彻底否定”，也是大相径庭的。

我认为，文革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引下，错误的判断政治形势，采用错误的方针政策发动的一场错误的大革命；文革发动者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领导了文革，他对文革错误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文革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最根本的起因，是一党极权造成的。所以，从这些最根本的方面讲，文革是应该彻底否定的。

但是，官方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仅仅是因为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仅是因为文革不该打倒“走资派”。他们把文革的责任几乎全部都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及他们痛恨的造反派。他们只是有限地承认党和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不敢承认建国后特别是五七年以后是左倾路线在统治全党，在祸害中国。这些，都是应该否定的，他们竭力回避。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把亿万民众推入文革大潮，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并非是文革发动者初衷所求的，但确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确实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一些东西，这些是官方所害怕的，因而被他们有意识地“彻底否定”掉了。

我举亲历的三个例子：

#### 1、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在文革之前，经过反右、“三面红旗”、学“九评”、参加“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洗礼”，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深深刻下了“反党就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样的烙印。什么叫反党？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异议的，对党有不满有牢骚的，甚至对基层的某个党组织有不同意见的，与党的某个基层领导有争执的，都可能上纲成对党的攻击，都可被视为反党。许多右派分子所谓的反党言论也就是这些，或者比这还轻微得多。

在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成为保卫党的具体体现。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校党委是不能怀疑的，蒋南翔是不能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到十天，校党委和蒋南翔这样的庞然大物一夜间就倒塌了。这对我禁锢的僵化的思想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一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的倒台，让我懂得了反对基层党组织和负责人与反党是不能划等号的。

后来北京市新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北京市新市委是刚刚对彭真的旧北京市委改组后新鲜出炉的，这应该是可靠的可信的上级党组织了吧？没想到它派来的工作组也会犯错误，而且是犯了很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对我禁锢的僵化的思想来了一次更大的冲击。我进一步懂得了，即使反对来头很硬的、自称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组，也是不能与反党划等号的。

尽管此前曾有北京市委烂掉了、北大党委烂掉了这样的先例，但是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更为巨大和震撼的。

那么多反蒋反校党委的人，因为蒋南翔的迅速倒台而平安无事。那么多反工作组的蒯派最后都咸鱼翻身，成了造反有理的革命左派。而这些人要是放在1957年，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十恶不赦的极右分子。

文革前一直进行党化教育，一直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党的高层，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强调“造反有理”了呢？那是因为文革的发动者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必须适度开放过去的禁区以发动民众运动群众以纠集炮灰。在文革之前，执政者需要禁锢民众的思想以稳定政权。



文革之初，刘少奇为了自保而抛出蒋南翔，毛泽东为了扳倒刘少奇而否定工作组，这一切在客观上起到了民众禁锢的思想被适度开禁的效果。对于政治领袖而言，他们从来不愿看到民众思想的真正解放，不愿看到民众站着造反，不愿民众拥有民主的权利。但是在一个特殊时期，思想解放（形式是“四大”自由）是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使用一下的。需要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放松民众的思想控制，目的达到以后需要天下大治了，再收回放松的自由，禁锢民众的思想。

文革初的思想解放也是有范围的被限制在某一框框里的。无论哪级党政组织，无论哪个显赫的大人物，都可以怀疑，都可能被打倒，但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是绝对不允许被怀疑的。谁要是敢于怀疑，敢于反对，依然是反党反革命的罪名，用《公安六条》镇压你，丝毫都不会手软的。

文革初期一次次的思想冲击对我而言是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尽管这种思想解放是极不彻底的，非常有限度的，但是，相对于原来完全禁锢的思想，此时犹如蚕茧破壳、东方破晓。

当时有一个“怀疑一切”的口号，它虽然带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对于突破思想禁锢、开启思想解放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从原来的什么都不敢怀疑到“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显然是个进步。于是，蒯派们敢于怀疑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于是，414也敢于对抗有中央文革支持的团派。所以，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全民也是如此。当然，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相比较，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样的思想解放并非是文革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所需要的民众始终只是崇拜他的盲民。“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就是他在五七年反右后留给民众的警示，是一根不能触及的高压线。文革中，他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跟随刘少奇的干部基础，他动用了“四大”武器这一民主手段。而这一过程中，“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的禁区突破了，这一点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更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无法避免的。在文革发动者的本意之外，文革在进行的过程中给民众的思想启示，归根结底，是民众在黑暗中的反复求索，是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是传统思想的层层突破，是混沌状态的最初启蒙。

## 2、清华两派争斗的非消极意义。

说到文革中清华两派的恶斗，没有人不反感的。揭老底、上纲上线、抢话筒、造谣诽谤、恶意攻击、抄家关押、非法绑架、直至真刀真枪的血腥武斗。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没有法治的两派争斗是暴民政治。

尽管两派恶性争斗有一百个不是，是不是一无是处了呢？我认为起码有两点是可资借鉴的：

一是因为有了两派，为了派别的生存和与另一派的搏斗，对派头头的监督是群众性的。譬如，我作为414的头头，不仅时时处于团派群众批判性的监督之下，也时时处于414群众批评性的监督之下。头头们的一言一行，关乎着本派群众的利益。我在《四项协议》问题上，沈如槐在《必胜》问题上，都被414群众批评过、炮轰过，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头头，我们尽力克服私心，尽力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愿望。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基本觉悟和自律，更重要的原因是两派争斗的现实，即两派共存互斗的体制逼着头头们只能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团派与414派，绝大多数头头都是一心为“公”的（派性意义上的“公”），极少私心，极少“官气”，努力“革命”，不敢懈怠的。可以说，当年团四两派头头的个人操行，总体而言比现在那些官僚们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这与两派互相监督的机制是很有关系的。

二是清华每个师生选择哪个派是完全自由的。选择的动机原因各有不同，但是都出于自愿。对两派都不满意的，可以选择逍遥。对本派不满意的，可以大声表示反对，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可以造反。即使跑到对立面那派去，也无权干涉。解放十七年来，学生的思想在这方寸之地有限空间里从来没有这样活跃过、自由过，充分尊重了个人的意愿。

这说明，在文革初期两派共生也好，大民主也好，群众监督也好，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文革的这段实践，为今后如何开展良性的党派竞争、为如何正确使用民主权利、为民众监督执政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教训。蒯大富反思说，“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文革前，没有民主，暴政为主。文革初期，大民主了，没有法制，于是暴民为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基础上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 3、民众的民主权利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干群对立。但是他把这些社会矛盾错误地扩大、上升成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敌我矛盾。他想自下而上地用大民主的方法向走资派夺权。这是文革的主线和主流。

文革前的十七年，连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上不断地制造新的差质群体。再加上一党极权的体制，所以官僚主义、强迫作风、多吃多占等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官民矛盾、干群对立、社会冲突中弱势的一方，被毛泽东鼓动起来以后，利用文革的大好时机，运用“四大”武器，向着曾经压迫他们的干部和基层组织斗争，争取他们的权利和权益。对于干部漫无法纪的残酷批斗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可以发现，越是官民矛盾尖锐、民怨越多的地方，民愤就越大，干部所受到的冲击越厉害，民众争取自己权益的思想也越觉醒。清华是如此，社会上也是如此。

庄严的宪法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是这些都是条文上说说的，并没真正实行。除了共产党、共青团等政治团体和学生会、文艺社团等非政治团体以外，结社是被禁止的。谁要求组织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必定被当做反革命的反动的团体被取缔。在文革中，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允许大大小小的红卫兵、战斗队、纵队、串联会、兵团等政治团体存在。这些团体自愿结合，参加自愿，退出自由。民众有了结社的民主权利，就有了表达意见的阵地，就有了显示力量的平台。民众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体，而是形成了有政治诉求的群体。

所以，只要给予民众以民主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民众在官民关系上、干群关系上就不再是绝对弱势的一方。民主和法制，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那只“铁笼子”。

我列举的三点，我不认为那点思想解放有多深远的意义，那仅仅是禁锢的思想牢笼里的一丝微光。我不认为两派互相制约监督有多大的实际作用，那仅仅是没有法制的用于两派恶战的派性手段。我不认为那点民主权利就是我所追求的法治下的民主，那依旧是专制下的不平等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在文革历史上这点微小的积极意义也是应当肯定的。针对当今的中国，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积累的。

否定文革，即否定文革产生的根源，否定发动文革的动机，否定文革过程中目无法纪，侵

犯人权的种种野蛮，否定文革造成历史大倒退的种种恶果。否定文革，与那些要肯定文革的思潮划清了界线，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至于是彻底否定还是根本否定，是全盘否定还是基本否定，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并不是原则的差别，本质的差别。我们究竟应该否定文革的什么？到今天还有哪些该否定的还没有被否定？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事物有没有借鉴作用？文革会不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诸如等等，对今天的我们可能是更关键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既要否定文革，更要反思文革。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民众的视角，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维度对文革进行深入细致的深度剖析，扬弃文革路线、文革思维、文革做派、文革文化等，汲取沉痛的教训和有益的借鉴，那样才能真正避免类似文革的大劫难以及暴力“革命”在中国重演。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百家争鸣】

毛泽东执着的理念

• 周龙辉 •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萧功秦认为，一个学者如果过于执迷于自己心爱的逻辑思辨、拥有文艺思维并且缺乏求真的敬畏之心的话，又恰好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就很容易犯普通人不会犯的常识错误。很巧的是，毛泽东把这四点几乎全占了，而且他作为一个学者与理论家的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领导人，所以他有无可比拟的贯彻自己理论的执行力。那么毛泽东就不仅仅和一般学者一样在学术上犯常识性错误了，他把这常识性错误运用到了实践、运用到了他领导的国家上。毋庸置疑，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运用到了实践的常识性错误。这些错误的不是突如其来导致的，其背后是一个个其深信不疑的理念。

那么，毛泽东究竟痴迷于哪些理念才有了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呢？笔者试图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个最基本的理念出发，探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原因，进而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了解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思考和认识。

◇ 理想的新社会

毛泽东早在1918年便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踏遍岳麓山的每一个山村，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虽然新村实验很短暂，但是却或多或少反映了毛泽东心中的理想社会，而且其中很多元素都在“文革”中呈现出来了。毛泽东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后，他深刻认识到共同体的凝聚力根本上来自于精神认同，只有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才能成为变得坚不可摧，因此他试图通过思想改造建立一个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强调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激励全体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时也的确做的不错，共产党党员和红军的精神面貌和纪律作风是有口皆碑的。建国后，毛泽东踌躇满志，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他把他的理想的新社会叫做人民公社。到了1960冬后，在严峻的死亡数字面前，他的理想社会模式不得不停止进行调整。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理想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在执行方面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一些中央领导人是理想信念出了动摇甚至是后退，也因此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教运动，发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打批判。

在种种情况皆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惊世骇俗的“文化大革命”。

著名学者杨炳章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多少少带了点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残酷冰冷政治斗争的背后隐藏着毛泽东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持。我们知道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共一线已经名存实亡了，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如果是为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根本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提供一种政治氛围和思想环境。李泽厚曾经说过“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的确，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情况不满意，要建立一个高昂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摆脱对物质的追求、思想不断崇化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民是“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在他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他这样描述他理想的新社会：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6年6月，毛泽东自知自己时间不多了，说了一段有点对自己“盖棺定论”意味的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通过这么一段话，既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心中是复杂的，虽然没有多少人拥护他的主张，但是在他看来这的确是他为了实现理想中的新社会的所做的重要举措。

◇ 反修防修

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目前学界也普遍认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思想起源于苏共二十大，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轩然大波，不就发生了铁托的普拉演说以及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这些对我党尤其是毛泽东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文章，但在此时在国内并没有过多地强调修正主义的问题。当毛泽东认定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愈加重视国内的反修防修，正如后来“九评”所说的那样“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1960年夏，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会议认为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原因，而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长期以来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没有彻底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泛滥。刘少奇在报告中就曾特别指出：如果中国搞不好，也会产生修正主义。所以我们提倡干部要参加劳动，每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十届八中全会中后，我国将国际的反修斗争和国内的防修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开展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挖掉国内修正主义的根子，决定开展一次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化所反馈给毛泽东的信息，使毛泽东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作了更严重的估计，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反修防修的紧迫感。毛泽东甚至认为，问题不但出在基层也出在上层。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变修都是因为中央出了问题，所以反修防修的重点也在上层。毛泽东说：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受到我们的信用，被我们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再加上毛泽东认为“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他看来，任何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其结果是，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而当毛泽东年事已高时，就愈加担心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他说“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应付诸东流了。”

当国际的反修防修失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见成效时，毛泽东决定来一次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根子，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 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呢？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呢？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争论不休。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建国后的多次思想改造和整党运动，如“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当然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思想根源。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不存在阶级冲突，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特别是在逐渐建立公有制之后。赫鲁晓夫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认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时期，不需要阶级斗争了，因为阶级已经消亡，苏联是一个全民国家。毛泽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长期斗争，资产阶级总是在寻求机会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知道中国自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逐渐建立起来，根据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方式（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多少划分阶级），资产阶级在中国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还有阶级斗争呢？这涉及到毛泽东对阶级划分的理解。

毛泽东认为划分阶级不仅仅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还要看政治和思想上认识。这种想法在毛泽东那里由来已久。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阶级分析不仅要考察经济地位，而且同样要考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因此他将当时的社会的六个阶级分成三类：我们自己（无产者）、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左翼和半无产阶级）、我们的敌人（军阀、地主、买办、反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右翼）。后来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以分析“中间阶级”的方法来分析资产阶级，即一种既从经济方面又政治方面来划分阶级的模式，也因此他认为，阶级不仅仅是由经济因素，而且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毛泽东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重要性的重视逐渐超过了对纯经济标准的重视，毛泽东指出，即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基本没有变化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动摇的，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原因。虽然他们在经济上是剥削阶级，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倾向于革命或者拥护革命的话，也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

相反地，如果少数无产阶级人士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动摇时，也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因此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方式来铲除阶级异己分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再加上毛泽东对此时国内现阶段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他不仅担心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后脱离群众、发展官僚主义作风的情况愈演愈烈。而且担心干部子女继续了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后，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形成一个剥削阶级。这在毛泽东眼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未来生存和中国社会主义变不变质的问题。这样最后势必被工人阶级当成资产阶级打倒。“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这个新途径和新方法就是文化大革命。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想法，这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行为。毛泽东虽然认为阶级斗争绝不可以妨碍我们的工作，但是要有专门的人来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而阶级斗争在这三者之间起关键性的作用。他曾在1963年的杭州会议讲到：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 结语

理念这个东西很神奇，它是由人类大脑创造的，一旦创造出来就具有独立性，甚至统治人的大脑，支配着人类的行为。这在宗教中表现得最明显，宗教这个理念由人类创造，但是创造出来之后，人类却被宗教所统治，驱使或者制约着人类的各种活动，是目前影响人类生活最彻底最持久的一个理念。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支配力的理念也可以是一种宗教。特别地，一个人的自信程度越深，那么理念对他的控制力就越强。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不仅他自己一向拥有强大的自信，而且在过去战争年代他的理论不断被实践证实，这就促使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更加自信，理念对他的控制就进一步加强，毛泽东成为了他自己信仰的理念的一个忠实的宗教徒。以上所提到的三个理念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三个基本理念，引导着毛泽东发动一场影响数亿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 摘自《共识网》2014-06-18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